



跨世纪老人的心愿

——陈翰笙教授谈教育

十余年来，木樨地这座高层住宅楼我不知来过多少次，每次心情都是那么急迫，急切地想见到那位可敬、可亲，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他年已九十有六，却依然那么健康、爽朗、诙谐。他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外国史专家、革命老前辈陈翰笙教授。

《群言》杂志约我写一篇访谈录，我专程造访，说明来意。翰老想了一下，认真地说：“让我谈，我还是谈教育！因为教育是一切的基础，没有教育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接着，翰老如数家珍般地、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切实可行的改革教育的做法。

翰老说，从我切身的经历，深感教育的重要性。我自小受到良好的母教和中小学教育，它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的母亲虽然目不识丁，却个性刚强，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对做人的道理十分明白。她常说：“宁吃开眉的粥，也不吃愁眉的饭。”“人是穷的，心是铜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穷，但骨头硬。又讲“不要见了大佛得得拜，见了小佛踢一脚。”教育我做人要正派，不要长双势利眼。还用格言教导我要以诚待人，又要敢于坚持真理：“做人总不要做到诸人远避。”“有理堂前打太公。”母亲的谆谆教导，我至今犹记在心。

我的开蒙是在无锡东林小学，校长顾卓如，修身教员黄淡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给小学生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教育学生要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要热爱养育我们的华夏大地。他们还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走路不可东张西望，不要进茶馆，以免染上恶习或遇上坏人……这些与智力启蒙一道进行的修身教育，对学生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中学是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上的，在这里我遇到了终身难忘的恩师傅熊湘先生。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他上历史课观点鲜明、活灵活现。他给学生们讲述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故事，唤起学生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明德中学还聚集了一批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老师，如黄兴、苏玄瑛、柳亚子等，他们通过教课，深入浅出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可算是我的民主意识的启蒙吧。后来，为探索兴邦报国之路，我去美国留学了。可以说，我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得益于我的良好的母教和中小学教育。

“小到一个人成长，大到一个国家的兴亡都可以体现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立国之本，这话一点都不错，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就是最好的证明。”陈翰老又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和发展侃侃而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陷入空前的困境。城市到处是断壁残垣、灰土瓦砾；200多万青壮年战死，1800万人无家可归；全国通货膨胀，日用品奇缺；日本经济倒退25年，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20多年后，日本奇迹般地发展起来了，据1971年统计，日本在国民生产总值、出口贸

易、黄金储备和主要工业产品方面都仅次于美国而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成为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了。当然，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是教育在日本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战后，面对一片废墟，日本有识之士明智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之外，别无他途！”相信“只有教育才是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成了举国上下一致关注的大事情。教育经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比如196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国民收入增加3.4倍，而教育经费则增加了3.7倍，占整个国民财政总支出的25%！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过：“日本人平均起来，恐怕是世界上受过高等教育最多的民族，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推行技术革新。”70年代末，《东京新闻》曾在一篇述评中说：“资源小国的我国，经历了诸多考验，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今日之日本，其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高度。”据统计，1985年日本上大学的人数占适龄者的50%！

“据我所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比较重视教育的。”陈翰老又举例说，比如丹麦对国民教育就非常重视，每年拨出年度预算的23%作为教育经费。从小学到大学除免交学费外，学生还有补贴。因而，目前丹麦是欧洲各个人力素质最高、技术人员最齐全的国家。又如法国非常重视中学的教育，一个人大学毕业后，还要通过国家考试，才能被聘用为中等学校的教师。80年代法国政府有忽视师范教育的苗头出现，就立即引起群众上街游行，以示抗议。可见，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重视教育，也正是由于重视教育，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发展起来。

“同这些国家比起来，我国的教育是很落后的了，尤其是这些年，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人只知赚钱，大量学生流失，去做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呵？”我不禁感叹说。陈翰老说：“是呵，我国的教育是很落后哩，就说教育经费吧，1990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52元，

名列世界倒数第几位，而一些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已达人均上千美元了！”翰老接着就讲起了我国的教育现状：我国建国后应该说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文革”前的17年，我们自己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农村文盲率也大大降低了。“文革”十年，教育事业受到很大冲击，“读书无用论”猖獗一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教育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是，近几年有些人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教育事业，“读书无用”和“读书吃亏”论再度抬头，许多年轻人都不读书了。据统计，1989年我国文盲率还占人口的20.6%呢！另外，我国还有许多贫困地区，那里的人无力负担上学儿童每年几十元的经费，许多渴望上学读书的孩子上不了学，全国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达110万。看到这种情况，我不禁伤心落泪。去年共青团中央发起“希望工程”活动，动员海内外炎黄子孙慷慨解囊，救助失学儿童，兴办希望小学。听说，现在已用救助款项使4万多名失学儿童重新上学。靠社会集资办学，也不失为一条良策。

我记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上说：“社会靠教育才能改变，社会靠教育才能实现新的项目，靠教育才能发展未来！”这话一点都不错，对我们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翰老以一位老经济学家的敏感预测到，今后世界的经济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那么对就业者的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可以说，将来市场之争也是人才之争，因而中国要想持久地发展，有后劲，就应该牢牢抓住教育这个关键，开发我国得天独厚的人脑资源，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要抓教育，我认为有这样几件事应该去做：第一是造成一种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稳住国内人才，召回海外学子。这几年，教育系统人员流失严重，许多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定居，不少人从教育岗位流向财大气粗的外资、三资企业，流向经济开发区，没有一支足够数量、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要

发展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对教育系统采取优惠政策，稳定人心，另一方面以安排合理，来去自由等政策，招揽海外游子回国。我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回来报效祖国的。记得刚建国时，许多学者克服重重阻力，甚至舍弃海外的家产和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而回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我和我的老伴就是应周恩来总理之召回来的。

第二，教育要靠全民办，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教育经费已由原来占财政支出的6%增加到12%，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太多，还是僧多粥少，所以国家应该提倡私人办学，集体办学。前些日子上海就办起第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个很好的开端。同时，还应该兴办半工半读学校。记得我初到美国留学时，就在赫门工读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学校，每天除去几小时学习外，就去做工作。在这里，我学会了养鸡、种菜、洗烫衣服、修理桌椅等。

第三，除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还应倡导职业教育。要搞现代化，不但需要大批科技人员，还需要有一定专业素质的高水平工人，这就要求多办职业学校，并对广大在职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日本人就很重视职业教育，在1970年修订的高中教学大纲中就规定设立被服、食物、保管、家政管理、园艺、农业概论等课目，还兴办水利高中、家政高中、农业高中、工业高中、商业高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工人。在各大企业中，也都注意培训工人，相继搞起设备先进、师资齐全、教材成套的培训中心，如新日铁公司八幡钢铁厂，就设立了面积为1.2万平方米的培训中心，可以同时培训2000人。正是这些职业教育，培训了大量的熟

练技术工人，在日本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中国从1902年就办起第一个职业教育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从1953年起，上海开办了技工学校，培训出的学生技术好，受到各工厂的欢迎。随后各地都兴办职业教育，上海兴办的技工学校最多时达350所。这几年，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开始大力兴办职业学校，听说上海到1982年就有职业学校452所。北京当前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商业、服务业急需合格的人才；外资企业、三资企业又急需涉外、公关专业的人才，所以北京的各种职业培训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冒了出来。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重申要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深化科技改革和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因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改革教育，不培养人才就没有出路！只要全党全国军民都关心教育事业、兴办教育事业，我们国家的腾飞将指日可待！

“翰老，祝愿您跨越三个世纪，迎接祖国更美好的明天！”我真诚地说，翰老说：“我已经96岁了，但我觉得还有劲头，还想做事情。七八十年代在我这里学过英文的人，现在都成了有用的人，我的学生遍及欧美20多个国家，他们都有信来。”我知道，从70年代初直到今天，翰老坚持免费教授年轻人学习英语，前后达300多人，这是何等执著的追求呵！当我起身告别时，老人大声嘱咐说：“我还可以教学，如果有人要学英文，你一定给我推荐来呵！”